

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走向

王旭 徐永智

[内容提要] 日本“印太战略”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经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继承和发展,已经逐步确立。当下日本“印太战略”理念宽泛,议题和伙伴广泛,泛安全化色彩浓重,是兼具结盟性、遏华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的综合国际战略。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受维系经济强国地位、“政治大国”夙愿以及遏制中国等考虑的驱动,将影响全球发展、损害区域海洋安全、干扰中国统一进程。同时,日本强化“印太战略”也面临着战略透支、经济基础不稳和外部支持不牢三重制约,这些制约因素虽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方向,但将限制其成效。

[关键词] 日本 “印太战略” 国际战略 “政治大国”

[作者介绍] 王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海洋问题、日本亚太战略;徐永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日本安全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安全和外交。

安倍晋三是日本“印太战略”的提出者,岸田文雄是日本“印太战略”的坚定继承者和发展者。安倍政府将“印太战略”作为对华地缘竞争的工具,但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外交平衡。岸田上台后,日本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中美竞争时代”,在亲美疏华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致力于成为美霸权下的“政治大国”和“印太”战略锚点。作为区域重要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印太战略”的动向和走向关乎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一、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动向

2016年，第二次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在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以“法治、航行自由、贸易自由”“经济繁荣”“促进和平与稳定”为三大支柱，呼吁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与日本共同努力维护国际秩序，以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为媒介强化亚洲与非洲联系，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日本从21世纪初以来便尝试通过“海洋价值观外交”聚合所谓海洋民主国家联盟。^①历任日本首相先后提出了“海洋民主主义联邦”“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海洋国家联盟”“钻石菱形构想”等多个倡议，安倍版“印太战略”与上述倡议一脉相承，即强调“海洋国家”身份与“海洋自由”“贸易自由”等价值观，强调经济合作，不以军事合作为主要战略路径。

安倍晋三请辞后，菅义伟上台短暂执政。菅义伟继承了安倍版“印太战略”。岸田文雄继任初期也未对日本“印太战略”进行大的调整。直至2023年3月20日，岸田在印度智库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了“印太新计划”演讲，“标志着日本‘印太战略’发生嬗变”。^②当前，日本“印太战略”无论在理念、议题还是合作对象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军事色彩凸显，经济安全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第一，日本“印太战略”的理念更加宽泛。岸田在印度的“印太新计划”演讲中阐释了日本“印太战略”的新理念。与安倍时期强调的“基于法治、自由与开放的海洋秩序是国际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础”^③不同，岸田将日本“印太战略”的理念主张扩展到宽泛的国际秩序层面。岸田称，“‘印太

^① 吕耀东：《日本“价值观外交”背后的海权图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网站，2013年9月27日，http://ijis.cssn.cn/xsyj/bkwz/201508/t20150826_2606376.shtml。

^② Hideshi Tokuchi,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Enhance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June 26, 2023, https://www.jiia.or.jp/en/ajiss_commentary/the-basic-orientation-of-japa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html。

^③ 「第196回国会における河野外務大臣の外交演説」、日本外務省、2018年1月22日。

战略’的根本是‘法治’和‘自由’，越是脆弱的国家越需要‘法治’，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行使武力等《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得到遵守，是国际社会享受‘自由’的重要前提”；“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也同等重要”，“世界不应由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导”，“应避免陷入地缘竞争”；“日本将关心脆弱国家利益、不助长阵营化、不强加价值观”；未来的路径是“尊重各国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以对话来制定规则”，构建“平等伙伴关系”，实现“在法治下多国共存共荣的世界”。^①这标志着日本“印太战略”所宣扬的核心理念从“海洋秩序”泛化为“普世价值”。即便价值观、发展阶段、对美国的态度等与日本有差异都可以接受，只需遵守“普世价值”就能成为日本“印太战略”的合作伙伴。

第二，日本“印太战略”合作议题进一步拓展，且围绕既有议题的合作更为深入。与“印太战略”以往三大支柱不同，岸田以新的四大支柱支撑日本“印太战略”。新支柱之一是“和平的原则和繁荣的规则”，基本涵盖了既有的“经济繁荣”“促进和平与稳定”两大支柱的内容。另外三个新支柱是“用印太风格应对课题”“多层次连通”和“海空安全保障”，此前的“法治、航行自由、贸易自由”支柱不再单列。安全合作、全球性议题合作等地位提升，海洋议题的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印太战略”的合作议题更加广泛。

在阐释“和平的原则和繁荣的规则”这一支柱时，岸田强调“公平、公正”。这与日本原先一直倡导的“自由贸易”立场不同，是对美国“公平贸易”立场的追随。其潜台词是不再追求较少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贸易”，转而支持使用经济手段追求“公平与公正”，以经济手段打压对手。此举凸显日本自诩为“西方阵营”一员的价值观色彩。岸田还着重宣传日本的国际经济合作理念是“自由、公平、公正的经济秩序”，有借助“印太战略”框架拓

^① 「岸田総理大臣のインド世界問題評議会（ICWA）における総理政策スピーチ」、日本外務省、2023年3月20日。下文“印太新计划”内容都引自岸田演讲。

展日本对外经贸合作之意。岸田指出，希望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基础上，扩大由日本倾心促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覆盖范围，与更多发展中国家缔结适合其经济水平的协定。

在阐释“用‘印太’风格应对课题”这一支柱时，岸田表示气变环保、粮食安全、公共卫生、防灾、应对虚假信息等全球治理议题日益重要，呼吁“印太战略”须将上述议题纳入合作范围，由各方合力构建“平等伙伴关系”“亚洲零碳共同体”。与以往日本“印太战略”相比，岸田对全球治理议题的重视显著提升。

在阐释“多层次连通”这一支柱时，岸田宣称将帮助小国、弱国提高连通性和克服脆弱性，从传统基建、数字基建、人才培养角度支持东南亚、南亚、南太岛国的不同发展关切。上述内容是日本多年来外援、基建出口政策的延续；“多层次连通”是岸田提出的新概念，旨在更好对接“东盟印太展望”。

在阐释“海空安全保障”这一支柱时，岸田重申此前日本“印太战略”“法治、航行自由”支柱中持续推进的人才培训、海警机构间合作、共同训练等承诺，并将“空域安全”首次列入“印太”安全合作范畴，举措包括增加雷达出口、培养用卫星进行海域态势感知的人才、加强无人机运用合作等。截至目前，这一支柱的推进最为迅速。

第三，日本“印太战略”的合作对象和伙伴更为多元。2016年安倍提出日本“印太战略”时，主要举措是“拉印、趋澳、促美”。岸田执政后明确提出以美为首，联合澳、印、东盟、欧洲等，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携手共同推进“印太战略”。^①2023年岸田“印太新计划”更将“印太战略”伙伴拓展至全球范围，中东、中南美也被纳入。

安倍执政后期，欧日交往中涉海议题和安全合作内容开始增加。岸田

^① 「第二百七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21年12月6日。

执政后，日欧“印太战略”对接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2023年1月，岸田连续访问法、意、英、加、美五国，为5月主办七国集团峰会造势，日本与各国的联合声明均提及“共同推进‘印太战略’”。其中，日英“印太战略”对接最实，走向“准同盟”。2021年，英航母停靠驻日美军的横须贺基地，美日英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2022年，英首次参加在日陆上联演。日英在安全领域快速走近，至2023年春，已完成《情报保护协定》《互惠准入协定》谈判。英国官方强调，《互惠准入协定》是“里程碑式的协议”，是1902年以来英日之间最重要的防务协议，有助于巩固英国对“印太”的承诺。^①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印太”海上安全合作也愈发深入。立场上，德、意开始表态支持日本有关东海、南海的立场主张；操作中，日、德建立外长与防长（“2+2”）机制，启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谈判，德多次派遣护卫舰巡航“印太”海域并赴日停靠，日德战机举行联合训练。日、意开始以“印太”合作名义开展联合军演。2023年5月，法舰停靠日本港口；6月，美日法在东海举行联合演习。

日本还试图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进“印太战略”。日本在基础设施和海空安全方面大力援助东盟，同时强调南太岛国与东盟国家一样是其非常重要的伙伴。目前，日本已在配合美国积极向南太国家提供海上执法援助和海缆建设投资。岸田“印太新计划”首次宣示将加强与更多国家的“印太战略”对接，将韩国与加拿大、欧洲并称为合作伙伴，号称要将“印太战略”合作推广至中东、中南美。2023年10月，岸田在首相官邸召开的“促进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会议上重申，日本要将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印太战略”合作对象。^②

第四，日本“印太战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安全化色彩，军事合作范围

^① 《两国1902年以来最重要协定英日签防务协定允相互部署军队》，《联合早报》网站，2023年1月12日，<https://www.kzaobao.com/world/20230112/131400.html>。

^② 「グローバルサウス諸国との連携強化推進会議」、日本首相官邸、2023年10月17日。

扩大、深度拓展。岸田在“印太”局势、日本角色、对华评价上频频发表激进言论，毫不掩饰其推动日本“印太战略”安全化的决心。如在2022年6月出席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时的主旨演讲中，^①岸田渲染当前地区形势的危险性，称“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乌克兰的今天也许就是东亚的明天”，“中国对印太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岸田宣示将大力拓展日本对外安全合作，许诺为东南亚海上安全项目提供更多援助。^②

“印太新计划”表明，日本将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联演联训，加速与各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以及推进对东南亚、南亚、南太岛国的海空态势感知能力等各类海洋能力援助。为更好落实对外军援，日本创设“对外军事援助制度”（OSA）。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认为，该制度能够让日本综合使用多种军事、民事援助手段与对象国进行更灵活的合作，适应对象国需要，以达到塑造安全环境和国际秩序的目的。^③

第五，日本“印太战略”新加入“经济安全”的内容。日本曾引领东亚“雁阵模式”，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做出一定贡献。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在亚太强化通过自由地交易与竞争实现经济发展的自由贸易体制”作为国家利益；2017年日本《通商白皮书》以大篇幅阐述自由贸易的优点。^④岸田上台后全面强化“经济安全”，将实现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严格限制对华技术出口作为“经济安保”目标。^⑤日本加入美国倡导的、以上述议题为主要支柱的“印太经济框架”，且支持

① 此次演讲具有代表性：第一，岸田是时隔8年后继安倍以来第二个出席该会议的日本首相，十分重视此次亮相；第二，岸田选择探讨安全的对话会来首次阐述其“印太战略”并不寻常；第三，岸田在香会上宣称，将于2023年前公布“印太新计划”。

② 「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グ 総理基調講演」、日本首相官邸、2022年6月10日。

③ 鈴木拓海、「外交・安全保障 第12回：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とは何か？ 戦略的な対外協力の連携可能性を探る」、<https://www.mri.co.jp/knowledge/column/20230728.html>。

④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日本内閣官房、第4頁、2023年12月17日；「自由貿易のメリット」、『通商白書2017』、日本経済産業省、<https://www.meti.go.jp/report/tshaku2017/2017honbun/i2110000.html>。

⑤ 「経済安保 半導体を確保 インフラ・特許・技術 法案 4本柱」、読売新聞、2021年11月14日。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中加入经济安全政策对接的新内容。

岸田还在“印太新计划”演讲中含沙射影指责中国,渲染“不可过分依赖单一国家”“在面对威权主义国家的挑战时,交给市场是不行的,必须官民一体合作来展开国家间的经济竞争”,意图通过渲染“经济安全面临风险”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经济合作之外。其具体举措包括以“高质量”为国际基建合作设限、与美澳协力建设“印太”海底电缆、与南太岛国开展应对非法渔业合作等,以应对“中国挑战”。

二、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动因

日本“印太战略”理念和合作议题的泛化,折射出日本想要引领塑造国际秩序特别是“印太”秩序的野心,也暴露其以“秩序”“规则”制约中国之意。日本“印太战略”合作伙伴不断增加,既是对美显示诚意,也有发挥“印太”锚点作用、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和拓展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考量。日本安全化与泛安全化激进政策的形成,得益于美国的松绑和支持,更出于自身想成为“军事大国”和维系经济强国地位的利益目标。

首先,日本朝野已经就强化“印太战略”形成共识。在日本政治决策过程中,政府与执政党扮演关键角色。当前,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持“倚美遏华”观点成为绝对主流,且由于拜登政府既加紧遏制中国,又拉近美日同盟关系,促使日本在亲美疏华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截至2017年,自民党内的有力政治家群体^①已呈现出亲美疏华的显著特征。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2017年,在被询问是重视“亚洲外交”还是“对美外交”时,有力政治家全部选择重视或比较重视“对美外交”;2012、2014年曾表示“难以判

^① 指较有希望在2030年前担任首相的政治家,标准为年龄在从政黄金年龄(2020年时42—71岁),10年内曾担任内阁或官邸内重要职务,排除部分年龄较大又仅担任过非重要内阁僚的政治家。

断”“稍重视亚洲外交”“两者均重视”的十余名政治家中，有80%转向“更为重视对美外交”。^①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虽然加大遏制中国的力度，但认为日本作为盟友“搭便车占便宜”，这导致本来就对美国履行承诺半信半疑的日本不安全感更加上升，^②促使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期战术性改善对华关系。拜登上台后继续奉行遏华战略并重视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日本随即改变战术上改善中日关系的方针，开始全面对接美国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美国版“印太战略”。

在野党方面，在日本政坛发挥牵制作用的两大在野党的外交政策与执政党自民党日益趋同。立宪民主党2021年选举纲领尚且使用“亚太”之措辞。2022年，该党开始使用“印太”概念，且外交政策主张出现质变。如强调“维持与强化基于自由、民主、法治、尊重基本人权的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这与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理念“基于法治的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如出一辙；强调安全合作，主张成立“自由与开放的印太会议”，围绕“航行与飞越自由”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在东海、南海、台湾等敏感问题上也与政府立场保持一致。^③无独有偶，日本维新会2022年选举纲领中也有与政府“印太战略”类似的内容。其提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和英、印、澳等共同价值观国家携手建设“海洋国家网络”；为应对“过度主张海洋权益成为国际社会威胁的国家”，和澳、印、东盟等强化合作等；涉及台湾问题方面，态度措辞甚至比官方立场更为强硬。^④

岸田的个人特质加剧日本“印太战略”嬗变的速度和烈度。岸田曾在安倍执政期间长期担任外相，对自身外交和安保领域的经验颇为自负，乐于对内外展示自身具有“全球视野”与“政治大国掌舵者”意识的形象，以“重

① 调查结果系根据作者对2012、2014、2017年选举前《读卖新闻》的地方版面统计。

② 安倍晋三、「日本復活の礎となった日米同盟最強化」、『外交』、第64号、第9—10頁；「安倍氏、恐れた同盟の悪夢 (Deep Insight)」、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9月5日。

③ 立憲民主党、「政策集2022」、第104—105頁、<https://cdp-japan.jp/assets/pdf/visions/2022/policies2022.pdf>。

④ 日本維新の会、「維新八策2022」、第14頁、<https://o-ishin.jp/sangiin2022/ishinhassaku2022.pdf>。

振日本的积极外交政策”为自己执政加分。执政之初，岸田就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口号，而“实施‘印太战略’”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三根支柱之首“保护普世价值”的首要政策。^①岸田也自视为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缔造者和倡导者。2015年岸田任外相时，在印度世界问题评议会发表演讲，提出世界已进入“印太”时代。2023年，岸田作为首相故地重游发表演讲，特意回顾了往事。此外，“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右翼势力的助推”是日本构建“印太战略”的背景之一。岸田作为自民党小派系的掌门人，乐于以强化“印太战略”团结国内政治生态、凝聚各派阀的信任。

第二，维系自身区域经济影响力以及在对华经济竞争中胜出，是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特别是在“印太战略”中强化经济安全议题的考量。日本希望能够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和既有地区经济合作基础，配合美国在经济领域削弱竞争对手，增强自身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战后，日本快速实现经济复苏和振兴，相较于本地区其他国家率先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长期以来，日本作为雁阵模式的头雁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在本区域的经济影响力强。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日之间的海外经济影响力竞争日趋激烈。在东亚区域结构当中，日本是具有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守成大国，中国是具有区域经济影响力的新兴大国。

日本谋求以“印太战略”重塑区域经济竞争，通过打压中国高端产业来提振日本高端产业。一方面，日本意图通过强化经济安全战略“降低中国追赶西方的速度，让冷战长期化”；^②另一方面，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不仅由于美国需求，更带有促进日本国内经济增长的性质。^③岸田施政演说强调，经济安全保障是日本增长战略的“第三个支柱”，要“实施确保战略性物资、

① 薬師寺克行、「岸田首相の『新時代のリアリズム外交』とは何か」、<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507599>；「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21年10月8日。

② 「経済安全保障の論点（下）國分俊史・多摩大学教授——『冷戦長期化は有益』の視点を（経済教室）」、日本経済新聞、2021年8月5日。

③ 刘云、徐永智等：《现代日本经济治理 百年变局的转型探索》，时事出版社，2022年，第44—45页。

防止技术外流的举措,构建自律型经济结构”,人工智能、量子等科技研发,建设半导体工厂等均属强化经济安全的范畴。^①在此背景下,岸田政府对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回应积极,在“印太新计划”演讲中强调“脱钩断链”“弹性韧性”等概念。换言之,日本认为,阻挠中国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进军,争取高技术产业链向日本回流并获取因美国等政治手段排华空出的市场份额,有助于振兴日本高端制造业。

日本挑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零和竞争,谋求维系日本的海外基建强国地位。日本是对外援助大国,但与欧美侧重教育、卫生、水等社会民生类项目不同,交通、通讯、电力等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一直是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构成。日本是区域基础设施投资的先行者和受益者,基建投资不仅深化了日本与对象国的关系,也推动了日本产业、技术、标准走出去。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凭借质优价廉的优势推进迅速,与日本提出的“基础设施走出去”战略形成正面竞争。日本将“基础设施走出去”战略作为推进“印太战略”互联互通这一支柱的抓手,大力推进海外港口开发,努力构建日本主导的“印太”互联互通网络。自知对华基建竞争力有不逮,岸田在“印太新计划”中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度依赖单独国家”“防止不透明、不公平的开发金融”,以此来破坏干扰中国对外基建合作。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框架下,日本与美及盟友伙伴共同推进“印太战略”,阻挠中国项目落地,日本成为事实上的受益者。

第三,日本认为自身离“政治大国”夙愿前所未有的接近,而“印太战略”是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和战略工具。20世纪80年代提出“政治大国”目标以来,日本从未放弃这一理想。岸田在首相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近代以来的日本有三个重要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明治维新;第二个节点是77

^① 「第二百一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23年1月23日。

年后的二战战败；又过了77年的今天，是日本面临的第三个历史节点”。^①在岸田提及的前两个历史节点上，日本曾因西方入侵、侵略战争失败面临危机，但随后抓住历史机遇，由弱转强。“第三个节点论”表明，岸田认为大变局已然来临，如果日本抓住机遇主动谋划，将在变局中再次成为对世界影响举足轻重的强国。

“印太战略”是日本主动谋划的产物，当前强化“印太战略”旨在影响甚至参与主导世界秩序。日本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日本是“印太战略”的首倡者，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②此举折射出日本以提出“印太战略”且这一概念为多国所接受为荣，它认为提出和强化“印太战略”可证明日本具有勾画国际秩序的能力，即日本有能力做“政治大国”。日本外交官公开表示，“安倍前首相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获得特朗普前总统和拜登总统的重视，是凸显日本外交实力和构思能力的典型案例”。^③拜登上台后继承和发展美国版“印太战略”，并将日本视作美国在亚太的“头号盟友”，这给了日本更积极参与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信心，反映在具体举措上，就是不断强化日本版“印太战略”。日本判断“印太”是全球地缘新中心，^④进而期望通过参与主导“印太”秩序来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从岸田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可窥见：使“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再上台阶的目的是在本地区维持、强化“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⑤“日本将在塑造新时代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⑥

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成为军事大国是日本目标“政治大国”的重

① 「第二十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2023年1月23日。

② 「2022年コロンビア大学ビジネススクール日本経済経営研究所（CJEB）年次東京カンファレンス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基調講演日本外交の課題～国家間競争時代における日本外交のフロンティア」、日本外務省、2022年5月25日。

③ 「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中国共産党は力を信奉」、読売国際会議、東アジア情勢を議論、読売新聞、2021年9月9日。

④ 「林外務大臣の戦略国際問題研究所（CSIS）における講演」、日本外務省、2022年7月29日。

⑤ 「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グ 総理基調講演」、日本首相官邸、2022年6月10日。

⑥ 「第4回東京グローバルダイアログ岸田総理大臣 挨拶」、日本外務省、2023年2月20日。

要组成部分。日本千方百计鼓吹“印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目的是强化军力和对外军援的正当性。因为只有“印太”面临“危险”，日本才能顺理成章地将强军、强化日美同盟、强化对外军事援助和合作、推动更多国家军事干预“印太”都包装成自身的“安全贡献”。日本在诸多战略文件与领导人演讲中，频频强调“印太”局势危险。岸田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日本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对于逼近日本、亚洲以及世界的挑战与危机，日本将更加积极地采取相应措施”。日本政府在2022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不排除印太，尤其是东亚可能重演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同样严峻的事态”“关于台海和平稳定，包括我国在内的印太乃至国际社会担忧迅速加剧”。^①

第四，遏制中国是日本“印太战略”的战略目标而非战略手段。岸田和时任外长林芳正多次指出，日本对“印太”安全的理解是，在“印太”实现“国际关系新均衡”，“应对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的种种难题”；甚至将“防止特定国家单方面改变现状”作为首要目标。^②其实，日本一直臆测中国崛起后将实行扩张政策，导致日本地位下降、安全受到威胁。这源自日本评估威胁时，偏重对手的硬实力而忽视对意图的分析。^③遏制中国并非是日本在美国压力下的“无奈之选”或“一时糊涂”，而是基于日本特色战略文化和现实主义逻辑的选择。换言之，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和日本“一拍即合”。

仅以中国实力超过日本为借口来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显然难以得到第三方认同。因此，岸田用“印太安全面临中国威胁”打包概括当前“印太”面临的安全问题。他在解读日本“印太战略”的安全政策时频频渲染“台海危

①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日本内閣官房、2022年12月16日、第3—4、9頁。

②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日本内閣官房、2022年12月16日、第11頁；「第211回国会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の外交演説」、日本外務省、2023年1月23日；「歴史の大転換の先のアジア太平洋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日本外務省、2022年11月20日。

③ 在2022年版《国家防卫战略》中第5页有如下表述：应该注意到，有强大军力的国家，可以随时具备侵略的意志……只要国家的决策过程不透明，强大的军力就构成了成为威胁的基础。由此可见日本“只要对方实力强于己方就是威胁”的战略思维。

机”，将钓鱼岛、南海、通道安全、台海等诸多迥异的独立议题混为一谈，刻意混淆内政、涉海领土主权争端与大国海权竞争的不同性质。这与一直以来日本海洋公共外交偷换概念的做法如出一辙。日本将钓鱼岛主权领土争端描述为中国“武力威胁”日本；将东海、南海局势相提并论，把日本说成是“与越南、菲律宾等南海沿岸国一样的中国海上扩张的受害者”，鼓动东海、南海问题国际化。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怀有强烈的危机感”，认为仅凭美日同盟也不能遏制中国，“无论是应对台海、南海问题”还是“守卫钓鱼岛”，必须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拉拢更多国家共同应对。^①因此，岸田访问欧洲时在首脑会谈中频频提出与欧对接“印太战略”。2023年4月，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记者会上，时任外长林芳正重申“欧洲和印太安全保障不可分割”。日本希望更多国家更多关注“印太”，尤其是向本地区增加传统安全方面的投入。

三、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影响

作为地区强国，日本战略动向将对区域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产生一定影响，也将对全球产生扩散效应。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已经从战略部署走向战略推进，其影响逐步显现。

首先，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已经处于逐步推进阶段，且获得了若干外部反馈，使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能见度有所提升。美国政府承认，“印太战略”概念由日本首创，并改变了国际话语。^②2022年9月，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指出，美日同盟从“保护盟友时代”进入“印太地区同盟投射时

^① 参见「第3回東京グローバル・ダイアログ林外務大臣基調講演」，日本外務省，2022年3月2日。时任外相林芳正表示，要在“印太”确保“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除美国外，东盟、欧洲、印度等也十分重要。

^② Matt Pottinger, “Shinzo Abe Invented the ‘Indo-Pacific’,”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shinzo-abe-invented-the-indo-pacific-india-china-japan-assassinate-gun-prime-minister-11657476831>.

代”。^①拜登推动亚太双边同盟框架向“小多边”网络体系转变，试图搭建以美国为中心且排除中国参与的国际互动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必然给予盟友、伙伴更多授权。“印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辐条”间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交叉或侧向联系并形成合作网络，这将造成美国作为“轮轴”的重要性降低，而“辐条”的重要性增加。日本不是“印太”霸权国家、更不是全球霸权国家，但与美国共同参与对亚太秩序的塑造，拜登打造小多边合作网络在客观上带动了日本区域地位和影响的提升。

日本抓住上述机遇跻身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下衍生的“印太次级准同盟体系”的“二把手”。在美国支持下，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的“印太战略”合作从务虚到落实。日澳缔结《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互惠准入协定》，结成“准同盟”。日印缔结《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多次声明携手推进“印太战略”。在2023年菲律宾挑动南海局势紧张之际，日本与美国、菲律宾在南海举行海岸警卫队联合演习、船舶维护演习；日本承诺向菲律宾再提供5艘大型巡逻船、“海域态势感知”体系建设所需的雷达等设备及中方舰船在南海的实时动向。岸田访问菲律宾期间，双方就加速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达成共识。日本强军似也得到了各方的“谅解”。法国、意大利、英国对日本的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持欢迎态度，^②越南、印尼等则表态，期待日本发挥更大作用或与日本强化合作。^③随着“印太”成为世界地缘新中心，无论是出于美方压力还是维系自身大国地位的需要，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对于“印太”的关心越来越高。各方介入“印太”需要在本地区寻找合作伙伴和落实战略的“锚点”。日本有条件成为锚点，且得到美

① “U.S. Ambassador: Japan-U.S. Alliance Has Entered Era of ‘Projection’ into Indo-Pacific,” <https://timesofjp.com/business/u-s-ambassador-japan-u-s-alliance-has-entered-era-of-projection-into-indo-pacific/>.

② 「第7回日仏外務・防衛閣僚会合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2023年5月9日；「日伊首脳会談及びワーキング・ランチ」、日本外務省、2023年1月10日；「日英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2023年1月11日。

③ 「日・インドネシア外相会談（日・インドネシア閣僚級戦略対話）」、日本外務省、2023年3月6日；「日・ベトナム首脳テレビ会談」、日本外務省、2023年2月9日。

方“许可”甚至支持。七国集团成员国开始将日本视为最重要的“印太”伙伴。不仅欧洲战略界对此形成共识，2022年加拿大首次发布“印太战略”也明确提出日本是合作伙伴，加拿大还向日本提出构建新“四边安全机制”，设想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四国合作。“印太”概念越热，需要以日本作为“印太”锚点的域外国家就越多，“印太战略”由此成为了一个好用的外交杠杆，增加了日本与各方战略沟通对接的话题。至此，“印太战略”不仅是日本“海洋价值观外交”的升级，更成为日本“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延续。

从更具体的层面看，日本积极推进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四边安全机制”合作，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全部合作，在上述机制和框架下加强了日本“印太战略”所关心的价值理念推广、海军与海警联演联训、海域态势感知网络建设、对华基建竞争、经济安全保障、供应链安全等议题合作，取得了一定回报。以经济合作为例，日本几次在美日经济“2+2”中对美国交涉新一代半导体技术引进问题。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八家企业已经联合成立新半导体制造公司，其关键技术来源于美国IBM公司。日本之所以能够获得技术、重振半导体产业，显然是迎合美国圈建“印太经济框架”的“红利”。

其次，日本“印太战略”强调经济安全，搞排挤中国的经济合作，这对日本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期看负面效应大，将撕裂区域经济合作，拖累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日本“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零和竞争，使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无法形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合力。日本国土交通省评估认为，未来全球港口基建需求将继续上涨，将从2017年的全球每年700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每年950亿美元。^①如果中日双方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将可发挥“1+1>2”的作用，但日本挑动零和竞争，造成了资源消耗和

^① 「海外展開戦略(港湾)(2022)」、日本国土交通省、2022年2月1日、<https://www.mlit.go.jp/report/press/content/001462444.pdf>。数据截至2021年6月，故正文中提出是2021年评估结果。

恶性竞争。近期，日本外务省在官网上公布了日本“印太战略”的支点布局，包括促进东南亚互联互通的东西经济回廊、南部经济回廊；促进西亚南亚互联互通的印度东北部道路交通网、孟加拉湾产业经济带；促进东南亚—西亚、南亚—中东—东南部非洲互联互通的蒙巴萨港城开发等。这与“海上丝绸之路”推进重点几乎重合。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以洛杉矶、孟买、悉尼、横滨为支点构建新的“印太绿色航运网络”，提出2030年前建设2—3条低排放或零排放的地区航运走廊。该网络以“绿色”新标将世界最大海运国中国排除在外，显然不利于全球航运减少碳排放治理。再如，海缆是全球关键基础设施，既有海缆的更新换代需求与流量增加带来的新需求叠加，使全球海缆建设缺口巨大，但美日阻挠使本应由中国承建的海缆项目几度搁浅，这将迟滞全球数字互联互通的发展进程。

中国和日本都是区域经济大国和全球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关乎区域经济良性互动的前景，也是亚太能否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更大力量的基础。直接投资往往代表着双边经济合作的长期趋势和信心。2001—2012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对东盟直接投资基本同频上涨，但以日本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的2012—2013年为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速几乎停滞，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大幅增加形成鲜明对比。岸田就任后，“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陷于长时期的恶化及遇冷状态，进一步削弱了日本经济界对华经济合作的信心，使中日间难以达成高水平的经济合作或贸易投资协议。当前日本“印太战略”渲染地缘风险，战略界要求“经济界必须探讨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经营规划”^①，日企对华投资意愿将更受拖累。这一恶果已经显现。2022年，日本对华投资净额仅为2019年的55%，2023年1—10月再度少于2022年同期。^②

① 「経済安保取り組み不可欠 江崎道朗氏講演 中堅企業の会」、産経新聞、2023年9月12日。

② 「別表6d-2 対外地域別（月次）」、日本財務省、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balance_of_payments/bpfidi.htm。

第三,日本“印太战略”破坏区域海洋友好合作的舆论环境,加剧区域国家间涉海矛盾,扰乱区域海上安全既有平衡。东海是与区域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息息相关的重要海域,中日两国领导人曾就“将东海建设成和平友好之海”达成共识。岸田上台后,日本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派船前往钓鱼岛海域“科考”;经政府批准出航的所谓“渔船”不仅在钓鱼岛附近频繁活动,且单次活动时长屡创新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通过媒体,将中方对日本非法活动的执法描述成“挑衅升级”。在这种“中国威胁”宣传攻势下,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下跌至历史最低水平,逐步认可岸田将日本“印太战略”安全化、激进化的政策。在2023年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中,认为“东亚安全环境严峻”的日本民众高达90.5%;认为对华外交最重要的是“以强势姿态反对中国入侵领海”的比例高达60.3%;认为应“活跃对华经济、人文交流”的仅为29.8%。^①此外,日本民众中认为“日本应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的占比高,^②而这正是岸田强化“印太战略”的核心路径。日本不断在东海方向持续强军、备战,美日军事指挥体系从平时至战时均趋于一体化,美日以“维护印太安全”为名在东海强化部署,破坏中日之间海上互信、激化现场矛盾,使中日海洋争端更为难解,也加剧了海域现场擦枪走火甚至局势升级的风险。

日本在“四边安全机制”框架下强化对外安全能力援助,打破南海海域既有安全平衡。日本持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保安机构合作,对其提供舰船和人才培养援助,2023年6月,日本开始向菲律宾、泰国、印尼三国实时提供在其周边海域航行的船舶动态。此举旨在应对非法捕捞和海上走私,更旨在遏制中国海警船和中国“海上民兵”;美日正在强化巡逻船对

^① 「安保環境『厳しい』90% 外務省の国内世論調査」、日本共同社、2023年5月26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bf814251fae23b630bdd40bcd5c4e56d485cba7d>。

^② 「日韓関係『良くなる』急上昇 本社・韓国日報社 共同世論調査 質問と回答」、読売新聞、2022年6月9日; 「内閣支持 高水準64% 本社全国世論調査結果」、読売新聞、2022年6月6日。

外援助和执法能力培训,此番提供情报与之相配合,有助于打造“对华合作网”。未来,日本还将向更多东南亚国家、南太岛国和印度洋国家提供船舶动态情报。而在南太等海域,日美以帮助相关国家应对“非法捕捞”问题为借口抹黑中国,并向南太、印度洋派出更多海警力量,插手海上安全监视和执法,干扰破坏中国与沿海国家开展海洋合作。

日本塑造“中国在东海、南海以武力改变现状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叙事,在双、多边场合不断对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欧洲国家甚至中亚、拉美国家重复这一叙事,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印太海洋安全”。“中国海洋威胁”逐步成为东亚系列峰会、七国集团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多边场合的议题,写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和七国集团首脑声明。在日本的不断输出下,2022年以来,北约、欧洲各国多次发表批判性涉华涉海言论。“印太战略”为日本与域外大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提供了“最大公约数”。日本作为推动欧洲国家介入“印太”海上安全和北约“印太”化的主要推手,加剧西太海洋安全形势的复杂程度。

第四,日本强化“印太战略”干扰中国统一进程。日本将东海、南海、台海问题国际化,统一包装为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违反国际法”“挑战国际秩序”“危害印太安全”等伪命题。日本为了回避自身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法律承诺,将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置于“印太”安全框架下探讨,着力突出“印太”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试图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定义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某种“公共产品”,将中国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促进统一的进程描述为“打破现状”、具有对“印太外部负面性”的行为。在美日联合声明等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双、多边联合声明中,强调“不能在本地区重演乌克兰悲剧”“台海和平稳定重要”。在2022年和2023年的七国集团外长会上,日本外相林芳正在讨论“印太”的环节都引领讨论台湾等问题。七国集团外长联合声明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称为“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

不可或缺的要害”。^①一旦上述话语陷阱形成，两岸分裂现状将被“绝对正义化”，中国针对“台独”的反制行动将被贴上“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标签，而外部势力联手干涉台湾问题反而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正义之举”。这将严重扰乱国际社会舆论。

当前，美日以“维护和平、稳定”为由正在将为武力干预台海事态而进行的准备正当化。双方在西南群岛方向的战备主要指向“台海有事”。日本在西南方向各岛屿的防空、反舰导弹链状部署初步完成，其作用比起应付“钓鱼岛危机”，显然更适用于台海冲突时封锁中国海空军进出第一岛链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美国改编在日本冲绳的海军陆战队，使之成为能在区域拒止圈内分散化作战的“濒海作战团”。日本亦已经与美军共同演练“濒海作战团”将实施的“远征前沿基地作战”战术。日方还为此整備港口、机场，演习疏散居民。同时，“美日+X”联演联训模式不断复制，美日英、美日法等多边演习在东海和日本本土开展，且规模和深度持续提升。上述动向既是战备也是威慑。美日高调展示军事准备，意图对中国武统台湾造成“成本强加”；不排除“一旦有事”，日本配合美国介入台海战事。在此背景下，“台独”势力将认为有外部势力撑腰，很可能进行更多边缘性试探，加剧地区不稳定。

结语

安倍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他认为“印太战略”是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尝试，是“日本提出的世界愿景”。^②可见，安倍提出“印太战略”之初就期待该战略发挥前所未有的战略作用。当前，随着安倍的继任者不断强化

^① 「G7外相コミュニケ」、日本外務省、2023年4月18日。

^② 安倍晋三等、『安倍晋三回顧録』、中央公論新社、2023年版、第129—130頁。

日本“印太战略”，日本“印太战略”的确已经超越了日本战后最为擅长的“海洋战略”和“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范畴，泛化为兼具结盟性、遏华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的综合国际战略。经过岸田政府近一年的推进，新的日本“印太战略”正在走向落实。这一进程难以逆转，这将拖累全球发展、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干扰中国统一。未来，如果日本判断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其将持续强化“印太战略”，但该战略未来的成效是有限度的，受战略透支、经济基础不稳和外部支持不牢三重制约。

一是战略透支。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善于以经济外交推动对外战略利益拓展，同时也注重建构“海洋国家”身份，以海洋外交推进对外战略实现。二战后日本以“自由、民主”典范自居，一直力求通过“价值观外交”聚合所谓海洋民主国家联盟。2013年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日本是持续追求‘开放、稳定的海洋’的海洋国家。^①安倍“印太战略”延续了二战后日本以经济外交辅之“海洋民主价值观”推进的对外战略路径，取得若干成效。而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则失焦于“海洋”“经济”这两大传统战略支柱，理念和路径泛化，举措过度安全化。历史上日本多次在宏观战略判断上出现失误，如今是否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驾驭能力，令人怀疑。

二是经济基础不稳。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一直低迷。作为全球第三的经济大国，日本虽然不会骤然崩盘，但与中美经济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不远的未来，日本经济大概率将被东盟、印度超越。经济份额的下降意味着难以增加外援、投资份额，日本政府的对外塑造能力相对下降。日本的经济体量不足以担负起“印太”地区领导力量的角色，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错误定位，其“印太战略”难免眼高手低。

三是外部支持不牢。从实效来看，日本构建“广域对华包围网”呈现

^①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第4、6頁、日本内閣官房、2013年12月17日。

“制衡不均”的局面。^①域外国家普遍关心“印太”局势,这是由于“印太”成为地缘新中心,而非源自它们与中国存在根本性矛盾。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华态度与美国、日本存在差异,更何况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是区域内国家的核心诉求。地区国家不希望被迫在各方当中选边站队,相反大多数国家认为,经济合作为促进正当的国家利益搭建了最佳框架。以上制约因素虽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日本“印太战略”的演进方向,但将弱化其成效。■

(责任编辑:王锦)

^① 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日本学刊》,2021年第5期,第83—85页。